



人文與自然·自然與人文： 論中國傳統「天地人合一」思想

辛意雲*

摘要

本文探討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歷史與文化意義，結合考古、經典與現代實踐，揭示其對環境問題的啟示。以《土地利用七千年》為起點，指出人為破壞（如戰爭、過度開墾）導致土地退化與文明衰落，例如，黃河流域因森林砍伐與戰爭淤積成災，卻也肯定長江流域精耕細作及現代沙漠農業的永續智慧。考古顯示，中國自新石器時代奠定大農業文明，長江稻作與黃河旱作分化，良渚文化城市化反映高度生態適應。經典如《尚書》、《詩經》記錄農業對天時依賴與技術進步；儒家、道家強調生態倫理與萬物平等；《易經》、《中庸》連結人類道德與生態責任，提出「贊天地之化育」。歷史上，戰爭與濫墾破壞生態，但「致中和」理念提醒平衡對待自然。中國上古先民以「尊生」信仰構建自然秩序和諧觀，經諸子百家升華為文化核心，對文明發展影響深遠。本文透過經典引文解讀，闡述「天地人合一」如何指引現代生態治理，強調人類以謙卑態度參與自然生生不息，實現永續發展理想。

關鍵詞：大農業文明、中國傳統、天地人合一、生態智慧、尊生

* 辛意雲，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

本文依據2024年11月7-8日法鼓文理學院舉辦之「2024自然的價值與保育：重探天地人關係研討會」專題演講內容改寫。

收稿日期：2025.05.24；接受日期：2025.09.03

Humanities and Nature, Nature and Humanities: A Discussion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tion of “Unity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ity”

I-Yun Hs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wisdom, integrating archaeology, classics, and modern practices to reveal its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issues. Starting with *Seven Thousand Years of Land Use*, it highlights human-induced degradation—such as wars and overcultivation—leading to land decline, as see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e to deforestation and siltation, while affirming sustainable wisdom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s intensive farming and contemporary desert agriculture. Archaeology shows China’s gran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began in the Neolithic era, with rice farming in the Yangtze and dry farming in the Yellow River, exemplified by urbanized Liangzhu culture reflecting high ecological adaptation. Classics like the *Book of Documents* and *Book of Songs* document agriculture’s reliance on seasonal timing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emphasize ecological ethics and equality of all things.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Doctrine of the Mean* link human morality with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proposing “assisting the transformative nurturing of *Heaven and Earth*.” Historically, wars and overexploitation damaged ecosystems, but the concept of “achieving harmony” reminds humanity to approach nature with balance. Ancient Chinese centered on belief in the “reverence for life,” constructing

* I-Yun Hsin, Emeritus Professor,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Manuscript received: 2025.05.24; Accept: 2025.09.03

a harmonious view of natural order, elevated by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into a cultural core, profoundly influencing civiliza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texts, the paper elucidates how “unity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ity” provides philosophical guidance for modern ecological governance, emphasizing humanity’s humble and balanced participation in nature’s ceaseless gene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deals.

Keywords: great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hinese tradition, Heavey-Earth-Human Unity, ecological wisdom, respect for life

一、《土地利用七千年》的警醒

在1970年代跟隨錢穆先生讀書的時候，他講先秦思想史，然後談傳統中國整個的地理環境，也談到了黃河。他說原先黃河的流域是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基地，許多文化的發展是從這裡起來的，但為什麼現在變成一個極其貧瘠的地方，他說這是我們大家要注意的。

在當時，錢穆先生拿出一本小冊子叫做《土地利用七千年》，是農業部、農業委員會的前身，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出版的，有學生在那裡工作，從圖書館拿出來的一本小冊子給錢先生看，他就叫我們看。他也講起自己過去的見聞，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國成立了國聯，組成了百餘人的考察團，到全世界去考察土地的使用，以及沙漠化的問題。

錢穆先生提及的《土地利用七千年》不僅是一部科學報告，更是一部警示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哲學反思，其核心觀點是土地退化源於人為短視行為，背後是對自然規律的漠視。《土地利用七千年》（Lowdermilk, 1953）的撰寫背景，是1930年代美國的環境危機。當時美國經歷嚴重的生態與農業危機。1929年經濟大蕭條後，中西部平原的過度開墾與乾旱引發了「沙塵暴」，數百萬公頃農田因風蝕和水蝕化為荒漠，數十萬農民被迫遷徙。同時，南方農業區也因棉花單一種植和土壤退化，面臨生產力崩潰。這些問題迫使美國政府尋求解決方案，尤其是希望通過土壤保育技術以恢復土地生產力。

美國的「沙塵暴」危機不僅是環境問題，更是一個文化與價值觀的警鐘。美國中西部農民的過度開墾忽視了土壤的自我修復能力，單一作物種植導致土壤養分耗竭。自然的生命力是文明的基礎，但若人類違背「生生不息」的原則，過度索取，則會招致自然的報復。《土地利用七千年》的作者Lowdermilk是美國土壤保持局（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的專家。1938年奉美國農業部之命，考察歐亞非三大洲，涵

蓋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中國、北非等地，過程中也和英國、法國和中國學者合作。期借鑑古文明的經驗，為美國農業提供警示與解決方案。這些地區的共同點是曾擁有輝煌文明，卻因土地管理失當而衰落。Lowdermilk的考察揭示了土地退化的普遍性，凸顯人類行為對自然的深遠影響。例如：原本肥沃的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尼羅河流域，卻發現這些被古老猶太居民稱為「受上帝祝福」、那「流著奶和蜜」之地，如今只是一片乾旱的沙漠。作者曾親自走訪這些「流著奶和蜜」之地，走了5個鐘頭，頂著55度的陽光，發現環境極度乾旱，土壤嚴重流失，令人感慨！記得離開臺灣前，臺灣剛經過颱風洗禮，單單一天就有1,000公厘雨量，而那裡竟然沒有雨水，太慘了！為何有如此變化呢？主要是因為豐潤肥沃的土壤全部都流失了！一切美好的生機也就不存在了！

又如中國黃河流域，黃土高原的侵蝕使黃河成為「中國之憂患」，考察隊不辭辛勞上溯到黃河上游及水源盡頭，見證了黃河上游原本豐茂的森林，被嚴重砍伐後成為光禿的坡地。而原本受森林覆蓋保護的土壤，便曝露在雨水長年侵蝕中。如此一方面導致耕地向坡頂撤退，使農地逐漸荒漠化；一方面造成大量泥沙和碎石沖進溪谷，遂令黃河成了滾滾濁流。

除了上述負面案例，《土地利用七千年》也發現可持久農業的古老智慧，例如，在黎巴嫩發現腓尼基人建造的岩石梯田，使陡坡農業延續數千年；荷蘭透過水利填海工程，使滄海轉化為高生產力的良田；中國佛教寺廟保護森林，植被覆蓋能有效減少侵蝕等。這些正面的案例顯示，順應自然規律的土地管理可實現生態與經濟雙贏。黎巴嫩的岩石梯田與中國佛教寺廟的森林保護，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最後，考察隊的結論是：原本豐肥土壤流失，主要源自人為的破壞，特別是戰爭的破壞，而後導致自然的加速侵蝕，而土壤侵蝕更是文明的「沉默殺手」！

錢穆先生指出，黃河之所以變成這樣，是來自於人為的破壞與戰

爭。最早的破壞起自於春秋，晉國大量的砍伐森林，致使山西許多的山光禿，導致大量土壤侵蝕，使得黃河變成了一個災區。到了戰國，齊國在黃河下游修建長堤，抬高水位，迫使洪水西灌魏國或北淹趙國。黃河流域的這些國家互相攻打，然後挖黃河的河堤去淹對方，加劇了黃河淤積和洪水問題，造成整個黃河的破敗。後來經過了秦、漢、隋唐還稍微努力修治，可是宋以後，遼金北宋的戰爭中又再次破壞，從此整個經濟移入了江南，黃河流域的發展就沒落了。錢穆先生對黃河問題的分析，揭示了人為破壞與生態退化的因果關係。因此，錢穆先生說，此後如何修治黃河是我輩的一個責任，需要讓黃河重新再成為一個文化發源的重要基地。

錢穆先生也說，他在年輕的時候不只是讀書，也有機會參加太湖的水利系統維護工作，很多心得是從實地工作的環境學習而來，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也提醒我們做人不能只會讀書，而要注意整個環境。傳統中國講天地人合一，人類能夠完整與和諧地融入整個環境中，才是人類的希望。

二、根基仍在的《中國土地利用》

專精中國農村經濟的美國農業經濟學家John Lossing Buck，在1920~1930年代擔任金陵大學農經系主任，基於在中國22個省、168個地區的實地調查和大量的統計資料，對二十世紀初期至1930年代的中國農業進行了系統分析。Buck（1937）在出版的《中國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一書中，詳細記錄了長江流域精耕細作與水土保持實踐。Buck肯定了中國農民在有限土地上通過精耕細作（如輪作、間作、施肥）提高土地生產力的智慧，這種智慧使長江流域農業數千年不衰。例如，華北平原的小麥—高粱輪作、華南的水稻多熟制等。Buck認為中國農民在土地資源極有限的條件下，展現了非凡的適

應能力，保護了土壤生態，這是「順天時」的現代體現。但也認為傳統模式已難突破瓶頸，主張通過技術改良（推廣良種、化肥、機械）、水利建設、土地改革（如減租減息、調整地權）和農村教育提升生產力。

錢穆先生亦提到他印象中1930年代的國際考察團，其中有地質、水利、農業等專家，當他們到了中國南方的一些長江流域水稻區，發現土地開發和水土保持竟能持續維護完善，以致土地利用了數千年，生產力依舊不衰！這些長江流域的水稻區農民，在耕作上採取輪耕制，以使土地輪流休息；同時在秋收後，利用挖水渠的淤泥覆蓋在田地上，以生養田地的生命力；此外，更配合天時、節氣選擇適當的植物種植，符合「適時、適地、適作」原則。

長江流域的精耕細作是中國大農業文明的縮影，體現「天地人合一」的智慧，也顯示古人對作物多樣性和土壤保育的重視，通過順應自然循環，實現生態系統生生不息，這為現代永續農業提供了啟示。錢穆先生說，這些國際專家的實地考察發現，長江流域傳統耕作方法既精耕，又合乎現代環保生態理念。專家總結：順應天時地利人和的耕作種植理念，乃中國重要的傳統觀念。於是在美國的建議下，促成中國於1948年成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何以中國的土地利用在戰亂中還能夠維持根基？這裡需要說明一個思想。我們今天都說人類的進步，是從原始漁獵社會、到原始畜牧社會、再到原始農業社會，那麼在農業社會發展了之後，大家可以定居和耕種，有時間來思考問題，文明由此誕生，全中國和全人類理應如此，這也確實是一個事實。但依這種說法再往前一跨就是工業社會，因此，認為在工業社會之前，上述這些社會型態全是落伍的。回顧作者童年時期，此類思想盛行，當時都說中國落後，因為中國始終在一個原始農業文明之中，而沒有跨入工業。然而事實上，中國雖也走過了和一般的、普遍性的人類文明的起始，可是中國已跨入「大農業文明」。

三、大農業與大農業文明

本文所述「大農業文明」，是以大農業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中國特有文明模式。「大農業」是相對於西方近代（十九世紀）以來，論述人類文明進步過程從原始社會過渡到漁獵社會、畜牧社會、農業社會，再到工業社會。然而，這種「農業社會」實則是基於西方歷史進程中的小部落、或說「小國寡民」的歷史經驗，其不足說明中國的大農業社會所發展的「大農業文明」。中國在6,000年前，各處大農業聚落就已如滿天星斗般的展開。5,000年前就相互融容而有了大國家規模，有城池、生產基地、水利工程等。到3,000年時的大國家體制和組織已完整建立。農田水利各有分工，學術、教育、城市、科技、冶煉都有發展，社會結構和國家體制組織趨於完整，文化經驗亦有所傳承。春秋戰國時，單就齊國首都臨淄人口就將近120萬人。這已超過歐洲當時任何一個國家。至2,300年前秦統一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並開挖南北運河，建設東西馳道。在法治的統領下，將東西南北融為一體。也就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大農業文明」。

所謂「大農業」，是指中國自新石器時代（約1萬年前）開始發展的大規模、適應性農業系統，超越原始農業階段，涵蓋廣闊地域、多樣作物（如長江稻作、黃河旱作）與精耕技術（如輪作、節氣種植）。它強調順應天時、地利、人和，實現土壤保育與生產力持續，不僅滿足生存需求，還融入文化與哲學層面。中國的「大農業文明」不同於其他民族小區域農業。這種文明不僅是經濟體系，還孕育文化（如「天地人合一」思想）、社會結構（如水利系統）與生態倫理（如尊生信仰），支撐中華文明延續，強調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對現代永續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中國之大或許超乎想像，而今天所有其他民族的農業文明，其實都是小國的、小區域內的一種農業文明。而中國遠從堯舜時代，像現在考

古挖出的陶寺遺址，也就是當時堯舜的聚落，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約2.8平方公里），是龍山文化的重要遺址，顯示出早期城市的特徵，包括城牆、宮殿和天文觀測設施，其文化影響範圍廣泛。所以中國文明基本上一開始即跨入大農業文明，然後發展出大農業文化，然後再進入一個以大農業文明及文化為基礎，所開展出來的屬於中國特有的一個文化和社會發展。作者建議未來思考中國文明和文化問題時，不妨從大農業、大文明和大文化入手。

中國人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加上水多、土地穩定。作者近期考察了寧夏的沙漠農業項目，見證了在極端環境中種植水稻的奇蹟。當地科研團隊選育出適應沙漠地下水條件的稻種，成功將試驗田推廣至塔克拉瑪干沙漠，打造出新的糧食基地。同時，羅布泊地區通過鹽鹼地改良，成為全球重要的鉀肥生產中心。這些成就並非偶然，而是植根於中國大農業文化對生態環境的深刻洞察與實踐經驗。

中國「大農業文明」的概念突破了西方工業中心論的局限，其目標不僅在滿足人類的生存需求，還透過對自然的深刻理解，實現了與萬物的和諧共存。大農業文明的成功在於其生態適應性，啟發現代社會應重新審視工業化對環境的影響，探索結合傳統智慧與現代科技的發展路徑。寧夏沙漠農業的成功可以說是對大農業文明的現代延續，顯示人類透過順應自然規律，通過技術創新，可以化不利環境為資源，實現了生態與經濟的平衡，這是「天地人合一」的當代實踐。

四、考古所見中國遠古以來農業發展

中國農業的起源可追溯至約10,000~8,000年前，這一時期奠定了大農業文明的基礎。考古學家在長江流域發現了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遺址，例如，湖南的彭頭山和皂市下層文化、浙江的馬家浜文化，距今約12,000年，顯示出早期植物採集與初步栽培的痕跡。新石器

晚期的大溪文化（湖北）、崧澤文化（浙江）則標誌著稻作農業的全面發展，距今至少8,000年。這些遺址出土了大量碳化稻米、石刀、石磨盤等證據，證明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已有悠久歷史。黃河流域的旱作農業也在甘肅秦安大地灣（約9,000年）等地興起，出土了小米、黍等旱地作物，顯示出北方農業的獨特模式。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崗文化和賈湖遺址，山東北辛、老官台和后李等文化，都可見豐富的農業遺存。

江蘇龍虬莊遺址、浙江河姆渡文化、湖南彭頭山等遺址，更進一步揭示了七、八千年前的農業技術已相當成熟，出土的石斧、石耜、骨耜、木耒、石刀、石鎌、石磨盤、石磨棒等等，還有碳化粟、黍、稻，屬於人工栽培食物。這些考古發現不僅揭示了中國農業的悠久歷史，還展示了其多樣性與適應性。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充分利用了濕潤氣候與肥沃的沖積平原，形成了以水田為核心的耕作體系。黃河流域則因乾旱氣候，發展出以小米、黍為主，輔以大豆、高粱的旱作農業。長江與黃河流域的農業分化體現了「天地人合一」的生態適應性，古人根據土壤與氣候選擇作物，這種智慧奠定了南北農業的基礎。這種生態適應性強調尊重自然的差異性，避免人為的統一化管理，這為現代農業多樣性保護提供了啟示。

西元前5,000年到西元前3,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國已形成了北方旱作與南方稻作兩大經濟文化區，農業成為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此一時期，聚落間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開始融合，出現了帶有環壕的聚落，反映出穩定的社會結構與人口增長。匯合磁山、裴李崗、老官台文化而來的仰韶文化（黃河流域）和廟底溝文化的分布範圍遠超前期文化，顯示出強大的融合性與擴張力。長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遺址面積達50萬至100萬平方米，擁有完整的城市結構，包括護城壕溝、排水系統、糧倉和作坊。良渚文化的玉器、陶器和建築遺跡顯示出高度的物質文明。此一時期的農業發展，不僅支撐了人口的增長，還促進了社會分層、技術進步與文化交流，為中國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西元前3,000~2,500年，中國更湧現出一批高度發展的農業文化，如紅山文化（遼寧）、良渚文化（浙江）、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湖北）等，標誌著史前文明的全面形成。這些文化的農田開闢更加廣闊，配套設施如水井、水塘、溝渠一應俱全。例如，良渚文化的灌溉系統包括人工運河與水壩，能有效調節洪水與乾旱，確保農業穩定；紅山文化的祭壇與玉器則顯示出農業經濟支持下的宗教與文化繁榮，其祭壇設計顯示古人通過觀察自然，構建了精神世界。玉器則多以鳥獸造型，反映了對自然萬物的崇敬。這些成就表明，中國的史前農業已超越基本的生存需求，進入了高度組織化的文明階段，為後來的經典形成提供了物質與精神基礎。

五、經典上所說的自然與人文

大農業文化的生產經驗，是中國傳統生態觀念淵源所自。中國的經典，如《詩經》、《尚書》、《周易》、《禮記》等，匯集了數千年的生產、生活與生命經驗，被稱為「經」，意為永恆之道。這些經典不僅是文學或哲學作品，更是對大農業文明經驗和智慧的結晶。例如，《詩經·豳風》¹ 記述農事活動：「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指正月修治農具、二月開始耕作；「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描述八月收葦、春季修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藜麥」，記錄九月築場、十月收穫多樣作物。這反映了古人依節氣安排農事，確保土地休養與作物多樣，體現對自然循環的尊重。

《尚書·堯典》開篇就說：「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句記載堯帝命羲氏、和氏觀察天象，制定曆法，指導農耕，反映了農業對節氣的依賴，體現「天人合一」的理念。此一記

¹ 本文所引古籍繁多，無法逐一列出原典出處，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見：Sturgeon, D. (德龍) 主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

述反映了農業對時間精準性的極高要求。農民必須根據節氣安排播種、灌溉與收穫，如立春播種豆類、立夏插秧水稻、立秋收割黍稷，任何時間偏差都可能導致歉收。這種對節氣的掌握，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時間觀念，將宇宙規律融入農業實踐，遠超西方工業時代的機械計時，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智慧。

堯舜時除了已有「知時」、「配合天時」的觀念，《尚書·舜典》：「食哉惟時」，強調糧食生產的重要性，記載舜帝重視農事，解決人民溫飽，體現農業文明的社會基礎。而後遇到「湯湯洪水」，堯帝就說：「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此句出自《尚書·堯典》，描述洪水災害，堯帝徵求治水人才，顯示環境治理的重要性。待夏禹採用疏導河川的方式，他的治水工程不僅解決了洪災，還促進了灌溉系統的發展，如黃河中游的溝渠網絡，為後來的農業繁榮奠定了基礎。是以孔子《論語·泰伯篇》說：「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讚揚夏禹節儉治水，優先發展農業灌溉，體現生態與民生的平衡。

《尚書·禹貢》記述禹治水後的成果：「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這描繪了九州統一、山川治理、土地分類與資源均衡，強調通過生態修復實現社會安定與經濟公平，體現人類參與自然改造的責任。《尚書·舜典》的「食哉惟時」與《論語·泰伯篇》的「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共同揭示了農業與生態治理的核心精神。「食哉惟時」強調糧食生產需順應時令，這與現代永續農業的季節性種植理念一致，例如，春播秋收的作物輪作。夏禹的治水則體現了儒家「仁政」的生態基礎，通過疏導而非堵塞，順應水流的自然規律，這與老子「上善若水」的思想相呼應。

《孟子·滕文公篇》說：「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則記述禹的治水成

就，疏通河道促進農業，奠定中原糧食基礎。這段記述凸顯了治水對農業的深遠影響，顯示生態治理是糧食安全的基礎，也強調自然的生命力支撐了人類的生存。夏禹的這些貢獻被記錄於《夏小正》，這是中國最早的農曆雛形，詳細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氣象與農事安排。這就是中國百姓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鳥獸和人間的生產活動，以季節的變化連結起來，成為一個「生生」之整體。

本文所述之「生生」，指宇宙萬物的持續生成與繁衍，源自《易經·繫辭傳》「生生之謂易」，強調生命循環不息，人類生產活動須融入此整體，順應季節變化。若就西方哲學觀點，「生生」一詞具有形上宇宙論之義：首先，「生生」之第一「生」字，乃就宇宙之創生而言。質言之，宇宙之本質即是創造及生命的創造。若問何以創造？誰在創造？則是「自然而然」的創造。「生生」之第二「生」字指「生命」而言，這表明在宇宙「自然而然」的創造中，以「生命」的創造為宇宙創造的中心。其次，「生生」二字聯用，表明宇宙的本質形態是不停、連綿不斷、永恆的創造。其中則以「生命」的發展最為核心。第三，「生生之謂易」，此句之義即宇宙之自然而然、本質性的「創造」和「生命創造」，連綿不斷「永恆性的創造」就是「易」，「生生」就是「易」。而「易」之本義指「變化」，也指宇宙的基本形態即是「變化」。換言之，宇宙不斷地創造所形成的變化，即是宇宙的基本本質性形態，這也就是說，自然的變化即是宇宙的本質性形態。

如《詩經·大雅·生民篇》：「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記述后稷選育優良黍種，反映西周農業技術的進步，體現對作物多樣性的重視，也啟發現代農業應保護原生作物品種，避免單一化種植的生態風險。根據古人解釋，「秬」是黑黍；「秠」是良種黍；「糜」也是好的種黍；「芑」更是良種黍。這表示至西元前3,000多年，「后稷」已知道品種的篩選，作更好的種植。《詩經》的《豳風》與《魯頌》中，也可看到如何培育、選種，知道植物收穫期的早與遲。

因此，在播種期就有先後不同的階段處理。以上皆顯示出西元前3,000多年的農業智慧。

我們也可以從《尚書》、《詩經》、《周易》中，看見周人在耕種制度上，已建立起養地的方法，並用多種方法改良土壤，培肥地力，這或許是最早的生態保育的工作吧？例如，《尚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敬授人時」，顯示依天時養地；《詩經·大雅·生民》云：「誕降嘉種……」，記錄選種改良土壤；《詩經·小雅·甫田》記述農民勞作：「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描繪田間除草、培土，作物茂盛，體現人文關懷與自然豐饒的和諧；「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強調作物順利生長，收成豐裕，這反映了古人對土壤保育與勞動價值的重視。

《詩經·小雅·大田》記述耕作過程：「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強調準備農具、播種多穀，作物茁壯，體現順應天時的精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反映先公後私的社會倫理與資源分配，融入生態平衡。《詩經·大雅·公劉》記述周人遷徙開墾：「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強調觀察地勢、陰陽、水源，丈量平原以開墾糧田，這體現了依地利選擇耕地的智慧，確保可持續發展。

《周易·坤卦》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強調土地厚養萬物。又如《史記·周本紀》記載，周之先祖后稷就已經「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司馬遷記述后稷依土壤性質種植作物，顯示生態適應的智慧。西周建立禮樂封建制度，在祭祀先祖時，以后稷代表所有的先祖，這是強調了「生生」，是有深刻意義的！

孔子繼承了這「生生」的觀念，並因此建立了人類世界中的「人學」，提出了「仁者愛人」的中國哲學思想。而「人」這一群體是要兼及對動物、植物等其他生命的尊重與愛惜。這是「泛愛眾」的「尊生」

觀念。孔子的「仁學」不僅關注人際關係，更將「仁」延伸至自然萬物，形成廣泛的生態倫理。例如，《論語·陽貨篇》云：「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表明認識自然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部分，與現代環境教育強調的生態素養相呼應。又《論語·述而篇》云：「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提倡不用細網捕魚、不射歸巢之鳥，體現保護生態平衡的倫理，與當代保育生物多樣性的理念一致。

這「尊生」觀念傳到漢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天地人一統」的學說中，另發展為：「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為仁？」（《春秋繁露·仁義法》），提出「愛民」與「愛物」並重的理念，認為真正的仁政不僅要關愛人民，還要保護鳥獸蟲魚。董仲舒的「天地人一統」將人類置於宇宙秩序的核心，強調人的道德責任不僅限於社會治理，還包括對自然的保護。

談到「仁政」，《孟子·梁惠王篇》更闡述了仁政的生態基礎。孟子說：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
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主張依農時耕作、保護漁業和森林資源，實現生態與民生的和諧，奠定仁政基礎，實現「養生送死無憾」的理想社會，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徵。

孟子更進一步說：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以上兩段引文，雖說是有關理想政治的作為，也同時描繪了一個生態與社會和諧共存的理想圖景：「不違農時」與「斧斤以時」，反映了對自然節奏的尊重。桑樹養蠶、畜牧繁育、農田耕作皆順應自然時序，確保資源永續利用。此外，孟子將教育（「庠序之教」）與生態保育並重，認為只有通過教育，人類才能真正理解「天地人合一」的道理。這與現代環境教育強調的「生態公民意識」相呼應。透過「教育」人才真能懂得「自然與人文」的和諧關係。

道家思想也為「天地人合一」提供了更深的哲學基礎，有關「萬物皆同源」的思想，在道家，不論莊子或老子，都是非常強調。如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強調人與萬物同源，提倡與自然和諧共存；莊子又說：「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秋水篇》），主張萬物平等，反對人為的貴賤區分，強調宇宙萬物的平等性與統一性。此外，老子在《道德經》也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闡述萬物皆從道所出，宇宙萬物皆同源；老子又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強調天地對萬物一視同仁，聖人應效法天地平等對待百姓。老子還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認為水因其謙卑與包容，能滋潤萬物而不爭，成為人類效法的榜樣。這些思想不僅塑造了中國的生態觀念，還對後世的環境倫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道家的「無為而治」強調順應自然規律，避免過度干預生態系統，與現代環境治理的「適應性管理」理念相通。例如，中國黃土高原的植樹造林項目，通過順應當地氣候與土壤條件，成功恢復植被，減少土壤侵蝕。道家思想可以啟發現代社會以謙卑態度修復生態，通過自然演替而非強行改造，實現生態平衡。

到了戰國晚期的《易經·繫辭傳》更是統括天地萬物在一個宇宙之中，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所以「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將宇宙創造力與生命繁衍聯繫，強

調「生生不息」的生態理念，天地之大德在於「生」。是以「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伏羲觀察天地萬物，創八卦以理解宇宙規律，體現天人合一。

《易經·繫辭傳》的「生生之謂易」指宇宙透過變化實現生命繁衍，如四季循環滋養萬物。具象而言，古人觀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將之應用於農業，避免過度開墾，與現代動態平衡生態學相符。伏羲的八卦創制則體現了古人對自然規律的深刻洞察，通過觀察天象與地貌，形成對宇宙秩序的理解，這為後世的農業曆法和生態管理奠定了基礎。

與《繫辭》差不多同時代的《中庸》則更進一步說：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非常完整地論述整個天地的維護，並達到天地萬物之和諧，以至天地之生生不息，並能夠永續經營者，是「人」！就在人類！《中庸》提出的理念，認為人類通過「至誠盡性」的生命覺醒，可以理解萬物的本性和內在規律；《中庸》的「贊天地之化育」則進一步將人類定位為自然的合作者，而非支配者，人類應培養順應自然規律的能力，參與自然的創造與修復，實現與天地的和諧共存。這一思想將人類的道德修養與生態保護緊密結合，凸顯了「天地人合一」的深刻內涵。

歷史上的戰爭與濫墾濫伐是土地破壞的主要原因。例如，清末民國時期，黃河水利系統因戰亂與管理不善而崩潰，導致頻繁的洪災與土壤流失。因此《中庸》開宗明義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強調「中和」是天地萬物和諧的基礎，提醒人類必須以適度與平衡的態度對待自然，點明天地萬物和諧的責任，是「人」—「人與自然」、「自然與人」的和諧，

責任在人。正如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裡說的：「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進一步明確了人類的生態責任。

中國上古先民在大農業生產經驗的累積下，產生出關乎「生命」的信仰，「生命」的本身成為人生最高的價值，完成此價值並賦予人生最大意義者，就是「人」。而「生命」是一個整體，人必須維護這整體自然秩序的穩定與和諧，天地萬物才有生生的可能。也就在這意識思維的架構上，構建了中國的生態基本觀念。

此後的中國經典，包括先秦的諸子百家，總結了此經驗，並整理升華，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後對中華文化及其文明的持續發展，產生最積極的作用。

六、結語

本文以「天地人合一」為核心，系統闡述了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形成、發展與當代價值，揭示了人類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深刻哲學。經由《土地利用七千年》與《中國土地利用》的對比，文章指出土地退化與文明衰落的根源在於人為破壞，同時肯定中國大農業文明的永續實踐，如長江流域的精耕細作與現代沙漠農業的創新。考古證據進一步證明，中國自新石器時代即奠定大農業基礎，南北農業模式的分化與良渚文化的城市化，顯示了高度的生態適應與社會組織能力。

經典文獻則從哲學層面深化了「天地人合一」的內涵。《尚書》、《詩經》記錄了農業對天時的依賴與技術進步；儒家、道家思想強調生態倫理與萬物平等；《易經》、《中庸》將人類道德修養與生態責任結合，提出「贊天地之化育」的理想。此一思想不僅是對大農業經驗的總結，更為現代環境治理提供了啟示。歷史上，戰爭與濫墾雖破壞生態，但「致中和」理念提醒人類順應自然，承擔起維護生態平衡的責任。

本文強調，中國文化的核心在於「尊生」的信仰，人類作為自然的

一部分，應經由覺醒與實踐，實現與天地的和諧共存。這種智慧不僅支撐了中華文明的延續，也為當今全球環境危機提供了寶貴借鑑。面對現代生態挑戰，如氣候變遷與土地退化，中國傳統「天地人合一」思想啟發我們以生態性與人文性的視角，探索永續發展的路徑。未來，結合現代科技與傳統智慧，或許可為全球生態治理開闢新局，重現「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理想圖景。

引用文獻

- Sturgeon, D. (德龍) 主編 (2025)。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5.8.1，
<https://ctext.org/zh>
- Buck, J. L. (1937).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16,786 Farms in 168 Localities, and 38,256 Farm Families in Twenty-two Provinces in China, 1929-1933*, Nanking: University of Nanking.
- Lowdermilk, W. C. (1953). *Conquest of the Land through Seven Thousand Years*,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